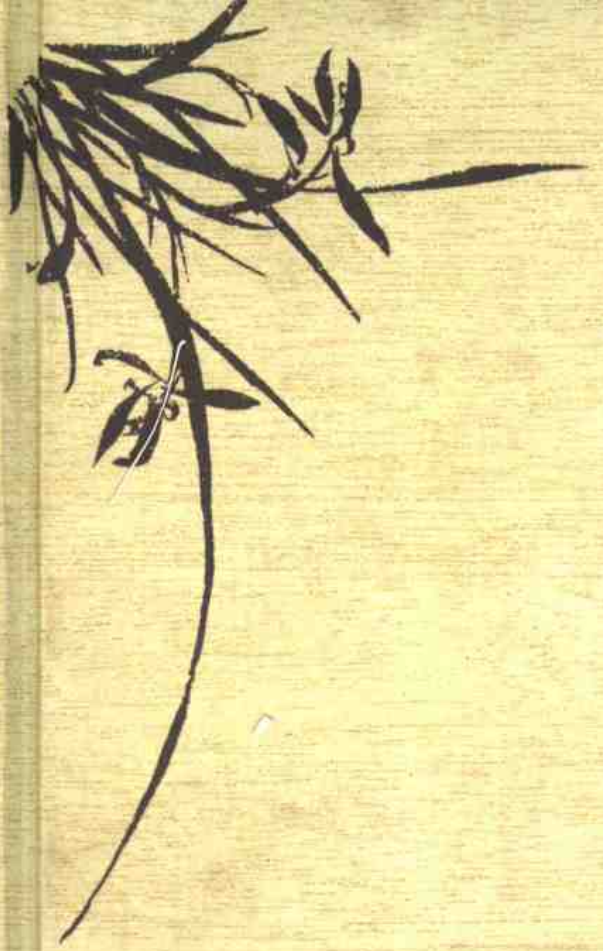


齐鲁文化学术文库

山东文学史论

◉李伯齐 著

齐鲁书社



请您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齐鲁文化学术文库

山東文學史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山东文学史论/李伯齐著. -济南:齐鲁书社,
2003.4
ISBN 7-5333-1156-6

Ⅰ.山… Ⅱ.李… Ⅲ.文学史—研究—山东省
Ⅳ.I209.9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22157 号

山东文学史论

李伯齐 著

齐鲁书社出版发行

(地址: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邮编:250001)

金坛市古籍印刷厂印装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3.25 印张 293 千字

2003 年 4 月第 1 版 2003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

ISBN 7-5333-1156-6

I·278 定价:30.00 元

序

山东省是华夏文明的重要基地，先秦时鲁国为中华主流学派儒家的发祥地，齐国的稷下学宫又是百家争鸣的论坛，秦汉以后文人学士历代辈出，堪称文化大省。

古有“人杰地灵”之说，山东更有“东方三大”之誉，即泰山、东海、孔子。乾隆皇帝就曾以“东方三大”命题考试特科举子。泰山屹立于华夏“大东”之地，左海右陆，孔子则诞生于其间，即所谓“一山一水一圣人”，成为山东人文的标志。作为齐鲁之邦的山东，在先秦时代是文明首善之区，它于后世的中国，甚至东亚的影响，堪与古希腊之于欧洲文化相比拟。然而纵观其后的情况，除了两汉经学（从济南伏生到高密郑玄）彪炳于世之外，魏晋南北朝以降，山东学术成果，只有像贾思勰《齐民要术》等少数精品问世。就整体而言，则随着王朝的更替，递次落后于长安、洛阳、建康、汴梁、临安、北京等首都周围地区。山东不仅距首都较远，其经济状况也不如江南富庶，这是合乎客观规律，理所当然的事。不过，若进一步观察，它的文学成就则偏

偏一枝独秀，突出于其他成就，甚至不亚于同时的首善之地。这却是很值得注意的。

例如我国最早的作家群体——建安七子，其出生地大都在今山东地区。魏晋以后，山东士族纷纷南下，如祢衡、诸葛亮、王羲之等都是山东文士中的著名人物。其后南迁山东士族的后裔，如鲍照、颜延之、刘勰、何逊、徐陵等都是卓越的文学家。根据那时的门阀士族严格保持其家学的习惯，其故土的流风遗韵是自不待言的。然而南迁大潮过后，山东本地的文学又继续发展，如唐之崔融、和凝，宋之王禹偁、李清照、辛弃疾，金元之杜仁杰、张养浩，明之李开先、李攀龙，清之王士禛、蒲松龄等，均享盛名于祖国文坛。上举诸家，除最后一位，都是诗（含词曲）人。自建安七子之后，山东一地于唐代就出现了以李白、孔巢父为代表的徂徕山“竹溪六逸”，于宋代出现了以范讽为首的“东州逸党”，金元出现了杜仁杰等东平剧曲作者群，明代出现了李攀龙、谢榛为骨干的“后七子”，清代出现了以王士禛为盟主的神韵派。这些山东人士在诗歌方面的影响，风靡全国。特别是李攀龙和王士禛二人甚至影响到东亚的汉诗界，至今流风未泯，真可谓“各领风骚五百年”了。山东诗坛昌盛，盖受“一山一水一圣人”之益，即孔门“诗教”的影响。

先秦各大学派，墨家非乐，道家以为五音五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色有碍于返朴归真，法家更认为文艺是害虫——六虱之一，惟有儒家重视礼乐文辞。孔子对《诗三百》的言论，已成为后世文艺理论的滥觞，“诗教”的重要意义已为世所公认。《乐记》一篇出于公孙尼子等孔门弟子集体编写授受，后收录于《礼记》之中，是我国首部以诗歌、音乐为主的文艺学专著。它的初稿，则早于亚里士多德的《诗学》。汉以后说《诗》者，如《毛诗·大序》即直接引用《乐记》，而传《鲁诗》的申生，传《齐诗》的匡衡均为山东人。南北朝时的刘勰《文心雕龙》、萧统《文选序》、颜之推《颜氏家训·文章》在理论上颇有建树，他们虽已侨居外地几世，未便归美于山东，但是也可说当时门阀士族的强劲的家学传统，渊源所自，不外于孔门诗教。山东本地自宋代以后，如石介的《怪说》以激情酷笔批判西昆体，又如李清照对词作的大胆的评论，都起了较大的影响。明代李攀龙用其《诗删》选本及谢榛的《诗家直说》表达了他们的观点。清代王士禛的诗论被人辑为《带经堂诗话》，还有其论敌赵执信《谈龙录》的问世，都对全国诗坛有巨大影响。这应当是孔门诗教的遗泽。

孔门“礼乐”之乐，其实包含了后世的音乐、诗歌、舞蹈、戏曲。这个涵盖文艺诸多品种的“乐”，在孔子以前的海岱地区已是相当发达了。如季札到了鲁国才观看了历代及各地的乐

舞，孔子也是“在齐闻韶”的，倡优侏儒之在有“女闾三千”的临淄也是领先于天下的。齐国的临淄是当时经济大都会，为商贸服务的市民文艺已经渗透于宫廷之内。我们从淳于髡的滑稽表演、邹忌与无盐女的谐隐故事等可窥见一斑。《庄子》所举志怪的《齐谐》，就已开署名为东方朔的《神异经》和《十洲记》的先河。那么，后来唐代段成式《酉阳杂俎》、清代蒲松龄《聊斋志异》的出现，就非偶然了。临淄市民文艺的嫡派应是表演艺术，不仅传播到宫廷，尤其盛行于民间祠庙宗教活动。汉代山东盛行祭祀城阳景王：“济南尤盛，至六百余祠，贾（商）人或假（扮演）二千石（高官），舆、服、导从（仪仗队伍）作倡乐，奢侈日甚。”（《三国志·武帝纪》裴注）又：“其俗好教饰子女淫哇之音，能使骨腾肉飞，倾诡人目。俗云齐倡，本出于此也。”（《隋书·地理志》）这种血脉所系，经唐代传奇中有关泰山三郎等类的作品流传，就出现了金元之际以东平府为中心的戏曲作家群，明清的李开先、冯惟敏、孔尚任以及《聊斋俚曲》亦相继出现。然而市民文学的主要成就，则是明清小说中的鸿篇巨制。《金瓶梅》的作者有王世贞、谢榛、李开先、贾三近等猜想，其中方言一事就排除了非山东籍的王世贞，我倾向于熟悉临清市井生活的谢榛为最有可能。《续金瓶梅》的作者是丁耀亢自无异论。而《醒世姻缘传》作者据胡适考证为蒲

松龄，近人虽有异说，但均认为作者是山东籍。特别是编撰《平妖传》、《三国演义》和《水浒传》的罗贯中，他的属籍有太原、东原两说，经近人王利器、罗尔纲考证，均认为是东原（今东平）。我原发现北朝时曾在济南南部建置太原侨郡一事，经王、罗二君举出的更充分的证据后，亦不需要了。如此说来，明清之李攀龙、王士禛虽执全国诗坛之牛耳，从整个文学领域来看，比起小说成就尚有逊色。

以上我勾画的山东文学发展的草图，则是读了李伯齐教授《山东文学史论》后，受其提供的丰富的史实与条分缕析的叙说启发而使然。伯齐先生执教于山东师范大学，研究齐鲁文学多年，早在1982年其与人合注的《济南诗文选》即问世，不久又独自编注了新纂之增订本，为研究齐鲁文献者所重视。特别是他对明代诗坛盟主李攀龙的研究用力最勤，既整理校点了《李攀龙集》（齐鲁书社出版），又评注了《李攀龙诗文选》（济南出版社出版）。其《李攀龙行年事迹考略》是拓荒之作，尤见功力。在担任本校图书馆馆长之后，虽增行政之烦劳，却又得益于左图右史的取资之便，所以这部新著既基于深厚的专业积累，又得于取精用宏的博览，遂以更高的成就呈现于读者面前。

山东文献遗产传统悠久，博大精深，可惜后人研究弘扬不够，我们几个同学好友对此是颇有

感慨的。世人对山东人文的评价往往褒先抑后，如："其在于诗书礼乐者，邹鲁之士，缙绅先生多能明之。"（《庄子·天下》）"（齐）多好经术，矜功名，舒缓阔达而足智。"（《汉书·地理志》）是以"齐鲁乃礼义之邦"而著称。然而到了后来，却以"山东大汉"、"山东侉子"而闻名了。似乎梁山泊一百单八条好汉，盖过了孔门七十二大贤、稷下学宫的百家学士的名声。自唐宋以来，江南经济文化日益发达，是与此有关系的。诚如李攀龙所说："齐鲁之间，其于文学虽天性，然秦汉以来，素业散失，……吴越鲜兵火，诗书藏于阛阓，即后生学士无不操染。"（《送王元美序》）道出汉末以后，北方屡遭落后的少数民族的侵扰，发生过的魏晋士族大姓纷纷南迁，以及唐以后的安史及辽金元清的战乱，山东均首当其冲。伯齐先生在本书中对此是重视的，在论述时不仅注意了作者作品的地域，并特予考察了作家的里籍分布以及家族文化，同时更涉及乡谊结社等（见本书第二、三章）。在探讨南北朝与隋唐时，更注意这一时期门阀士族的重要作用（见第五、六、七章），这是很有见地的。山东历史前期的文学盛况，与门阀士族的士大夫文化有巨大关系。这个文化的构成或可说是基于鲁学的礼义和齐学的辞辩的结合，即鲁学是德，齐学是才，从而形成"德才兼备"的山东人文精神。若专从文学方面来看，可以用"齐气"（曹丕《典论·论

文》）来标准其风格。此“齐气”源自战国稷下，盛于建安之年，然后随山东士族南迁，与当地文化相结合，融合到中华文化之中而繁荣昌盛，才淡化而消融。（其实山东文人南下的事例，甚至拖延到宋代李清照、辛弃疾的避金，金末东平艺人的迁杭等，也算是其尾声余波）从本书各章，诸如“地域概念”、“里籍分布”、“文化家族与家族文学”、“地域文化的融合”、“旧士族的衰落与家族文学的变迁”等节目的标题中即可看出著者是抓住了研究山东文学史的重要环节的。当某一地域的强势文化渗透到更广大的地区，并取得新的滋养后，又反馈到其原产地，共同缔造了伟大的中华文化，这正是研究山东文学史的必有之义，更是伯齐先生对撰著本书的关注所在。

上述所谓对山东文学的评价“褒前抑后”，虽有一定道理，但未必尽然。问题是如何看待文学体裁。“五四”以前，士大夫轻视小说戏曲，认为是虽可以消遣欣赏，却不能登大雅之堂、文学之林的；能入《文苑传》的只能是骈文、散文、诗赋的作家。诗文辞赋这些正统体裁，山东在唐宋以后虽也不乏佼佼者，然而就整体而言却落后于江南。《聊斋志异·司文郎》中的余杭生对登州宋生所说“山左、右并无一字通者”，语虽刻薄，却代表了那时的普遍见解。幼时曾闻里巷老儒讲，某江南先生向山东人自夸了家乡的鸿文

名著之后问道："贵处也有什么名世之作吗？"山东人说："不敢不敢，鄙处不过出了部薄薄的《四书》而已。"里巷老儒的意思是为山东争气，不过也体现了中气不足，他也隐隐觉得前盛后衰的现象了。于是有人以为这是因为江南人善于互相标榜，而山东文人却互不服气：明代李攀龙和谢榛同为"后七子"骨干，后来意气相争而绝交；清代王渔洋迥出群伦，偏偏他亲戚晚辈赵执信出头来吹毛求疵，云云。对于这些偏爱故乡的山东读者，或许读了伯齐先生的著作之后，这种心情就会缓解下来。因为山东士大夫于魏晋南渡之后，为本乡留下了空白，然而邹鲁君子虽去，"齐东野人"却坚守在本土。也就是说留在齐地的中下层的文化也因此而得以充分发挥出来。我们在本书中可以读到当年东夷神话、齐国谐隐、汉代通俗辞赋的"基因"，宋元之后又在山东大地茁壮成长起来了。如金元间的东平府戏曲，明清的小说（除长篇之外，还有《聊斋志异》、《小豆棚》的短篇佳作），更有《宝剑记》、《桃花扇》以及《白雪遗音》等各种通俗作品如丽日经天、春风拂地的群芳争艳一样。从现代学术观点来看，小说戏曲才是文学阵营中主力部队；相比之下，那些朝廷中的士大夫赞赏的桐城古文、江西诗派就难与比肩了。所以假如某位江南秀士手捧一卷《惜抱轩文集》问："贵乡也有什么文学名著吗？"山东侍子将答道："不敢不敢，只有几部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金瓶梅》、《聊斋志异》而已。”伯齐先生正是突破了旧的文学观，对于东平戏曲、明清小说等山东作品对全国文学的贡献给予了应有的评价。

综览本书，山东文学的特色，在于从先秦奠定基础时就非一元单立，而是由齐鲁两种不同的素质而相反相成的。在学术方面鲁的影响较深，在文艺方面则“齐气”较浓。两者长期互相渗透，形成“鲁德”“齐才”的“德才兼备”的山东文学的宽博浑厚而不乏灵性的特有风格。它在魏晋以后多次向南方输送的同时，也输入了塞外的养分，在金元之后又出现了新的文体的繁荣。它的浑厚宽博，极易与全国各地文学交融，从而汇入了中华文化的浩淼大洋之中，很难再辨认出山东一地的特色——真是“泱泱乎大国之风也”，“荡荡乎民无能名焉”。

本书虽属开创之作，但却全面考察了历代山东文学的状况，并条分缕析地体现出其来龙去脉，是有益于学术界的。同时，它又是研究山东文学发展史的一个新的起点，有利于在此基础上继续前进。伯齐先生正处于中年以后的丰收时段，今后随着当今学术的进步，新领域的开拓，有些问题，如考古学、社会人类学，以及方言学等屡有新的成果发现，跨学科的研究成果也将愈益出现，相信他定能再接再厉，做出更大的成绩以嘉惠士林，是所至盼。

伯齐先生嘱我作序，殊不敢当。以上只是我

读他这部大著的印稿后的粗浅体会和受的启发，拉杂写出，只能算一篇读后感而已。以此聊以塞责，敬请著者与读者教正。

徐北文

2000年11月12日

前 言

研究中国文学的人，大都注意一个古老而又日新的命题，即所谓“知人论世”。要“知人”，自然要了解有关作家的生平行事；要“论世”，则涉及作家生活的特定的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也就是说，只有把作家置于他曾经生活过的具体的时空环境之中进行考察，人们才会获得具体而生动的认识。

在以往的文学研究中，考察文学及其发展，人们大都注意时间因素，偏重于考察发展过程，而常常忽略文学生成的空间因素。譬如研究一个作家的生平，一般注意考察其生活的社会环境，特别是现实政治生活中的表现，而较少注意作为“社会环境”的人文地理环境的考察。实际上，文学生成和发展的因素是相当复杂的，所反映的社会生活内容也有其特定的时空因素，如果要深入探讨文学生成的环境和发展的原因，就应从时间和空间两个方面加以考察。就时间而言，作家生活及其作品内容反映的生活状态，都是特定历史条件之下的产物；就空间而言，作家及其所描写的对象的生活环境，包括社会环境和自然环

境，都是十分具体的，也都属于一个特定的地域范围。譬如研究一个作家的身世，首先要考定其乡里籍贯。籍贯是一个作家的出生地和早年的生活环境。一个人的出生地，对于其先天禀受具有特殊意义，而其身世家庭则可对其后天所受的教育与影响作出说明。而这个人的出生地所负载的不只是一个地名、地理上的一个村镇，或是山河湖泊，而是该地所处区域的文化传统以及由此形成的风俗习惯；其后天教育的内容，也包括他耳濡目染的当地的文化风习以及父母体现其文化价值观念的言行举止。因此，一个作家的出生地及其生活的特定的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对于研究一个作家便具有重要意义。而这一切又是与某一地域相关联的，于是文学研究就与某一特定的地域发生了关系。

地域与文化、与文学的关系，古今中外都有人论及，而进行较为深入的研究，则是近年以来的事情。金克木先生曾经提出文艺地域学研究的构想[①]、袁行霈先生则明确提出文学地域性的问题[②]，中华书局《文史知识》编辑部自 1987 年以来举办地方文化与文学专刊，以及近年来地方文学史的出现，都说明文学的地域性已经引起文学研究者的注意。

---

① 金克木《文艺地域学研究的构想》，《读书》1986 年第 4 辑。

② 袁行霈《中国文学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0 版。

一

所谓地域，当然指一定的地理范围。但是研究一个地域的文化和文学的关系，则涉及到该地域的自然环境、文化传统以及社会历史诸多方面的问题。关于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我国古代思想家、哲学家曾有不少论述。《管子·水地》篇认为一方水土便产生一方人的气质、精神和品格：

> 齐之水道，躁而复故，其民贪粗而好勇；楚之淖弱而清，故其民轻果而贼；越之水浊重而洎，故其民愚疾而垢；秦之水泔聚而稸，淤滞而杂，故其民贪戾罔而好事。齐、晋（按指两地之间）之水，枯旱而运，淤滞而杂，故其民谄谀葆诈，巧佞而好利。燕之水，萃下而弱，沈滞而杂，故其民愚戆而好贞，轻疾而易死。宋之水，轻劲而清，故其民闲易而好正。[①]

《国语·鲁语下》也有“沃土之民不材”，“瘠土之民莫不向义”[②] 之说。《淮南子·地形训》也认为人和环境是统一的：

① 《管子》卷一四《水地》，《诸子集成》本，中华书局1986版，238页。
② 《国语》卷五《鲁语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版，205页。

> 土地各以其类生，是故山气多男，泽气多女，障气多喑，风气多聋，林气多瘿，木气多伛，岸下气多肿，石气多力，险阻气多瘿，暑气多夭，寒气多寿，谷气多痹，邱气多狂，衍气多仁，陵气多贪，轻土多利，重土多迟。清水音小，浊水音大。湍水人轻，迟水人重。中土多圣人，皆象其气，皆应其类。①

此言人类生存的自然环境，对于自身寿命、生理特点及其禀赋、性格都有直接影响。明代地理学家王士性则认为，人们所处的自然环境对于一地风俗具有重要影响。他以浙江地理为例说：

> 杭、嘉、湖平原水乡，是为泽国之民；金、衢、严、处丘陵险阻，是为山谷之民；宁、绍、台、温连山大海，是为海滨之民。三民各自为俗，泽国之民，舟楫为居，百货所聚，阊阖易于富贵，俗尚奢侈，缙绅气势大而众庶小；山谷之民，石气所钟，猛烈鸷愎，轻犯刑法，喜习俭素，然豪民颇负气；聚党与而傲缙绅；海滨之民，餐风宿水，百

① 《淮南子》卷四《地形训》，《诸子集成》本，中华书局1986版，59页。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